

在臺女性外籍配偶之 婚姻家庭權益保障調查與探討

程立民·王信文

壹、前言

據臺灣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臺灣內政部戶政司，2014），2013 年臺灣地區人民與外國籍人民結婚登記計 7,950 對，占全年總結婚對數 147,636 之 5.38%，其中以東南亞地區 4,823 人最多，其他地區僅 3,127 人。另據臺灣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入出國及移民署，2014），1987 年至 2014 年元月止，外裔、外籍配偶總人數為 158,005 人，其中女性為 143,116 人，近十倍於男性 14,889 人。而在國籍的分佈上，前三名分別為越南籍 89,338 人、印尼籍 27,974 人及泰國籍的 8,381 人。也就是說，這廿多年來的外籍配偶（以下簡稱外配）主要的來源國都是東南亞，光是越南籍者即占 56.5%，超越所有其他國家總和。

外籍配偶人數激增的原因大致與幾個因素有關：在產業結構上，全球化趨勢與國際貿易往來激增，臺灣產業結構改變，政府的南向、西進經濟政策，以及婚姻仲

介推波助瀾等都是因素（張菁芳，2008）。此外，再加上臺灣重視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的教育觀（王信文，2014），也為跨國婚配帶來新移民的浪潮，衝擊臺灣社會結構，也豐富了臺灣社會多元文化。

然而，基於臺灣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化印象，她/他們多是被貼上社會底層的貧窮者標籤，除多數走入家庭外，就算參與勞動也多從事藍領階級或服務業。由於文化背景及價值觀等的差異，致外配家庭的摩擦、社會適應的不良及認同感的不足的事件頻傳，顯見外配家庭的協助及照顧已刻不容緩。臺灣當局不能只希望外籍配偶在臺灣社會能創造出怎樣的經濟貢獻以及文化融合，卻不相對地提供足夠的權益保障。本研究除以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法親訪外配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實務，並兼訪移民署官員平衡性地澄清外配易於誤解事項，並輔以學理的分析，試圖爬梳出外籍配偶在臺生活中的婚姻家庭權益保障所面臨的問題及解決之道。

貳、外籍配偶在臺生活中主要遭遇的權益問題

在移民理論中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簡單的說，推拉理論認為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和遷入地位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交互作用而成。推拉理論的概念可溯自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的遷移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廖正宏, 1985)。拉文斯坦認為，人們所期望有更好的物質條件，便是造成人口遷移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有利的經濟因素比不利的經濟因素更能引起人口遷移活動。以前述臺灣地區外配的國籍分析，確實可以發現到這樣以經濟因素為主的現象。東南亞籍的外配，也相當程度舒緩了臺灣地區基層人力上的需求。

在2003年的臺灣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報告」中，主管機關內政部明確揭示「重視外籍與大陸配偶的權益與需求，與當前我移民政策及兩岸政策並無二致，在『身分從嚴，生活從寬』的原則下，對於這些因為異國與兩岸通婚而來臺生活者，鑒於他們不僅與國人共同生活，也共同負擔家計與教養下一代的責任，政府有必要訂定照顧輔導措施，使之融入我國社會，共創多元文化價值的國家。」，該照顧輔導政策目標，旨在「(一)協助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早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共組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而衍生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二)

以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整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平等對待外籍與大陸配偶，落實保障其權益與需求。」(余政, 2014)。

該部嗣於同年六月邀集各相關機關修正「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分工表」，依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八大重點工作，據以執行。惟在外配激增之餘，臺灣行政部門遲至2004年5月始完成2003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草案資料。依臺灣監察院報告(監察院公報, 2007)，「顯見行政院事先未縝密規劃移入人口輔導方案，亦未曾謹慎考量移入人口總量管制問題，導致各項問題叢生，實有嚴重怠忽。」

本研究謹將在臺外配於生活中主要遭遇的各項權益問題，收攏於法律應保障的公民權、工作權及家庭權等權利層面討論，俾集中焦點。

一、公民權

公民權係只有公民始得享有之權利，例如參政權、服公職之權利。對於外國人與本國人基本權利採取區別規範者，在立法例上可以參考德國基本法的規定。該法明文區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Jedermann-Grundrechte)及德國人之基本權利(Deutschen-Grundrechte)。李震山(2009年)認為，對於每個人基本權利中具有原權、自然權、固有權(Urrecht)性質之人權，不得為差別待遇，因該等權利之遂行

，外國人與本國人無本質上差異，若為差別待遇即構成歧視。至於其他涉及國民權、公民權、甚至經濟權者，則可為合理差別待遇。另有（廖元豪，2008）認為，基本權依照權利性質作區分，部分原因在於臺灣移植德國憲法基本權理論時，也同時移植了德國的基本權利三分法（人權、國民權、公民權）。因而，有公民身分者能兼享有人權、國民權與公民權；在國內之外國人，則只能享有人權（法治斌、董保城，2012）。是以，在法制上，仍然可以對外國人予以差別待遇。臺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54號解釋即明示：「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對人民入境居住之權利，固得視規範對象究為臺灣地區有戶籍人民，僑居國外或居住港澳等地區之人民，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差異之規範，惟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職是之故，對於外籍配偶的公民權保障，在臺灣現有法制觀念及架構下，尚難與臺灣地區人民等同視之。

臺灣地區目前的移民政策為「移出從寬、移入從嚴」之原則，在移出方面，基於憲法保障遷徙自由，對於有意移居國外並能取得移居國家之許可者，均准許移民。在移入方面，外國人必須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在取得公民權之依據與法源上，外籍

配偶與大陸配偶二者顯有不同。外籍配偶適用「國籍法」，大陸配偶則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2條規定，外國人經移民署查驗許可進入臺灣後，應於15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取得外僑居留證後外籍配偶若連續居留臺灣3年以上，且每年合法居住183天，得依「國籍法」第4條規定符合申請歸化。然而「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0條指出，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檢附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文件。並向住所地的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該戶政事務所查明後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再經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轉內政部，核發「準歸化國籍證明」。

此外，臺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8條規定歸化國籍者，得向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取得居留證的外籍配偶在臺灣地區連續居住1年，或居留滿2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或居留滿5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者，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0條，申請「臺灣地區定居證」並憑臺灣地區定居證申請戶籍登記及請領身分證。換言之，外籍配偶來臺後最快4年則可取得身分證，成為臺灣地區公民（陳德信，2002）。

然而，臺灣地區民眾是否認同或歡迎外配加入本地的大家庭，其實有疑慮的。據2004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社會意向基本調查」，在大陸女性配偶的公民權態度方面，43%的臺灣民眾傾向嚴格限制，36%的民眾傾向有點限制，21%的民眾傾向不要限制。就東南亞女性配偶公民權的態度而言，37%的臺灣民眾傾向嚴格限制，43%

的民眾傾向有點限制，20%的民眾傾向不要限制。基本上，約有二成的民眾，對於大陸或外籍配偶取得臺灣的公民權，抱持開放的態度；但另外八成的民眾，則抱持比較嚴格限制的態度（陳志柔、于德林，2014）。

雖然 2009 年由臺灣地區業已公佈實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由國際法效力導入國內，但其實標榜人權的臺灣，對逐年增加的外來移民，其來臺後的基本權益（人權、家庭團聚、勞動就業、居留歸化、公民權等），並未受到應有的對待與尊重；臺灣當局的移民政策，更未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與時俱進地更加開放多元。在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大陸配偶多稱「大陸妹」，稱東南亞籍外配「瑪麗亞」，骨子裡都蘊含了歧視的概念。

在多元的社會下，理應對不同國籍及生活態樣（life styles）予以尊重。但實際上，不論是臺灣官方的移民署或外交部，對於前述取得公民權流程的各個環節，其人為的操控上容有重大瑕疵。以研究者所在之臺中市的 2014 年媒體報導為例，外配家屬即分別向民意代表陳情有關外交部與移民署刁難（自由時報，2014）。官方的多以「依專業程式處理相關申請，絕無任何國籍或執業的歧視」等說法回應外界質疑，但當事人卻不見得認同（越南話題論壇，2014）。

在 2010 年臺灣移民署所進行的面談分析，僅有不到千分之二兩的兩岸婚姻是有問題者，而其它千分之 998 被認為是正

常；相信外籍配偶應也是正常者居多。（蕭勝芳，2011），既然大多數的外配婚姻都是合法，臺灣各界即應屏除成見，敞開心胸接納異國婚姻，而不應再不公平對待。現行移民法涉及外配有關限令出境處分等程式，不適用臺灣行政程式法，其本身亦無任何程式規定，不得不說是長期忽視外國人權利的重大疏漏（葉南君，2011）。

二、工作權

世界各國為保障國人的工作權，對外國人之工作權都有立法限制，臺灣亦然，外籍勞工須取得主管機關工作許可後始得就業（李惠宗，2012）。在許多國際條約中，常見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的規範，指國與國之間應維持不予歧視的待遇，這也是國際習慣法中的重要原則。在各種國際組織公約與建議書中，移民勞工的國民待遇問題極受重視，在考量到國家安全、社會與經濟的穩定下，應合理給予他們在經濟生活、工作場所與勞動條件的平等對待（鄭津津，2010）。

對於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主要規範於臺灣就業服務法的第五章（第 42 至 62 條規定）。其中針對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規定，另制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式準則」、「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及「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等配套規定。此外，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9

條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停留、居留期間，不得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但合法居留者，其請願及合法集會遊行，不在此限。」。

在臺灣地區，於外籍配偶結婚後拿到外僑居留證，不須申請許可，即能申請工作證，享有合法工作權，法源係來自於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規定；又考量外籍配偶在婚姻關係消滅後，居留期限尚未屆滿且居留事由尚未變更前，仍有在臺工作之需要，故該會已於 97 年 6 月 3 日放寬外籍配偶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在原依親居留許可未失效前仍得繼續在臺工作；另外籍配偶於婚姻關係消滅後，經獲准與其在臺之未成年子女或其他直系血親共同生活，並獲准居留，亦得依就業服務法第 51 條規定，申請核發工作許可可在臺工作。

但實際上外配要進入職場並不易。首先，她們必須面臨的乃係「語言問題」，因為語言不通，常在職場中遭到不公平對待。且外配所面臨的工作，多為 3D 性質（dirty、difficult、dangerous），工資所得稱為血汗錢實不為過。邇來臺灣社會逐漸多元化，若干外配已走向微型創業者（如經營小吃店），對臺灣社會創造出的經濟貢獻是不可忽視的（蔡青龍、鄭冠榮，2010）。

然而，也有相當數量的外配無法取得合法工作管道，往往只得從事地下經濟活動，接受較低工資及忍受雇主刁難等，使其身處於無保障之就業環境（例如未加入勞工保險），對這些未取得身分證者而言，較惡劣的工作條件幾乎成為一種常態，若其非自願性填補勞動條件不佳之工作，則

要提升勞動條件的勞動者要求將較無著力點。本文以為，目前國人所較不願意從事之工作，多為勞動力密集之工作，工作時間偏長且勞動條件偏低，故常產生人力不足的問題，她們正可有效地補充人力缺口，解決此種產業長期以來人力不足的問題，若願意從事國人所不欲從事之工作，未來必能成為職場上的生力軍，對提升我國勞動參與率應有其正面效應（許崇賓，2009）。

但是，不論是法律的環境或社會實務面，不見得對外配是友善的。如對於是否應給予非法外配在道德上被認為須提供的工作條件（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休假、加班費等）的問題，葉南君（2011）：「答案很明顯為是。每一個當代民主國家對其管轄權內之市場功能設定限制，雖然全球化使國家管制內部市場條件更加困難，但所有民主國家都建立基本工作條件之限制。這些限制反映了民主國家的最低標準概念，在這之下境內經濟活動應被加以管理。因此這些標準應適用於所有勞工，包含合法工作者及無證移民。...移民執法是一回事，使無證移民享有最低標準的工作條件是另一回事。既然國家對於合法工作者保障其工作條件，其亦應保障無證移民之工作條件。」

此外，葉南君（2011），臺灣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60 號解釋涉及外國人投保勞工保險，依照相關規定喪葬給付不在給付範圍之內，大法官竟然宣告系爭規定合憲，主要理由為「勞工保險為社會福利制度，而喪葬給付兼具社會扶助性質，外國

人之眷屬在國外死亡非屬社會安全制度所欲保障之對象，故禁止領取該給付有據」。該號解釋面對公權力剝奪在臺工作之「外國人」，特別是藍領勞工的權益之情形，明顯採取非常寬鬆的審查標準，毫無考慮到眷屬未能來臺與外勞共同生活，多半係因我國的法律限制，或外勞經濟地位始然，相較之下白領外籍專業人士之眷屬通常有能力隨同舉家遷移，反而這些享有社會優勢地位的白領外籍專業人士可以在系爭規定下獲得喘息，從大法官的解釋可知臺灣司法者對於弱勢外國人具有相當的歧視。

鄭津津（2008），基於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大多數的外籍配偶對臺灣制度並不熟悉，其中當然也包括與就業有關的法律。在缺乏相關法律知識的情況下，就業過程往往比較不瞭解自己的權益，也因此較容易受到雇主的不當對待。舉例而言，多數跨國婚姻家庭，除了期待其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外，也會要求其出外工作，分擔家計。為了避免她們有了收入之後，難免控制，有些夫家成員，可能是公婆或是配偶，會要求雇主將工資直接交付給其公婆或配偶，而非其本人。此種作法顯然已經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所規定的「工資直接給付原則」（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

其實，對於外配工作權的保障，臺灣官方也逐步改進。如在早期外籍配偶離婚，並有子女或配偶死亡等原因致婚姻關係消滅後，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其他事由准予繼續居留者，在臺居留期間應仍有工作之需求（養家），卻因原來法規限制，而衍生必須申請工作許可始得在臺工

作或甚至無法工作之問題，臺灣勞委會（現組織改造為勞動部）進一步擴大保障外籍配偶之工作權，已於 2011 年 8 月 18 日修正發布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及第 11 條規定，增訂婚姻關係消滅之外籍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准予繼續居留者，亦得免經許可合法在臺工作：

1. 依親對象死亡。
2. 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3. 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4. 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5. 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

在社會上，也有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等團體，來維護在臺生活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之勞動權益，能在勞動職場上獲得真正公平的待遇，提供新移民對勞動相關法規及資訊等之認識（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2014）。透過這些利益團體的壓力，也相當地促進臺灣政府逐步彈性地放寬法規上的限制。

三、家庭權

在法律體系上，臺灣憲法雖未明定家庭權之法文，僅在第 13 章第 4 節間接針對家庭有關的母性、婦女、兒童之生活、教育等為概括之規定；惟從反面推論，憲法

對於具有生育、教育、社會、文化等多重功能之社會最基本單位的家庭，若不予保障，殊難想像。基此，臺灣憲法第 22 條所預留的概括保障空間，學者(李震山, 2004)認為即係家庭權保障之處。

依臺灣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2 號解釋文謂：「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增進夫妻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以保護婚姻制度，亦為社會大眾所期待...」。即在闡明揭示「憲法保障人民結婚自由權」。至少，結婚自由應無區分本國或外國，若能對她們平等對待，有助於婚姻、家庭穩定發展，並可俾益對下一代之教養。臺灣本即是一個移民社會，對於已定居成為「臺灣新移民」者，除應予以照顧、輔導外，政府應有義務提供多元服務，確保外籍配偶因跨國婚姻所應享有的權利(李震山, 2003)。大法官釋字第 552 號解釋理由書亦謂：「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係為維護配偶間之人格倫理關係，實現男女平等原則，及維持社會秩序，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即本此意旨而制定。婚姻自由雖為憲法上所保障之自由權，惟應受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限制...」；釋字第 554 號解釋另謂：「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是以，婚姻自由係對合法婚姻受制度性保障，及法律規範下之自由，更係人格自由發展之要素，自應當成一種基本人權而受尊重。因

此，外籍配偶在臺或來臺居留後，國家應該尊重婚姻移民之配偶的婚姻自由與人格發展，此一權利應受到制度性之保障(楊君仁, 2011)。

對於外配在臺灣家庭權受到的侵害及影響，臺灣監察院曾做出專門報告，認為(監察院, 2014)「憲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及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國際公約均保障婚姻與家庭權，家庭權之內容應包含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按人類婚姻及家庭先於國家、憲法而存在，憲法有關婚姻與家庭權之內涵係在保障國民先天之家庭生活，從而婚姻及家庭非僅作為社會制度而受到保護，而應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憲法有關婚姻與家庭權之範疇，至少應包括婚姻自由權、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The right to family reunion)暨未成年子女享有父母保護教養權等，國家對此應建立制度性保障，使家庭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俾確保家庭制度之存續與圓滿」、「外籍配偶來臺簽證申請遭拒時，外籍配偶有權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何況真實婚姻之外籍配偶如無法來臺，將侵害國人配偶暨其未成年子女之家庭團聚與共同生活權，應給予訴訟救濟，始為正辦；惟外交部對於外籍配偶簽證申請准駁，一概認為係屬政治問題，不受司法管轄，實屬侵害當事人訴訟基本權，顯有不當。」、「外籍配偶之身分，係基於與我國人民之婚姻關係，而婚姻不僅涉及當事人個人身分關係之變更，且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參照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242、554 號解釋)，其婚姻與家庭權所涉對象包括本國配偶及其子女，又外籍配偶之入境、居留更涉及日後國籍、工作權、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之取得，影響其所組成之本國家庭的婚姻與家庭權（含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甚鉅。故其簽證作業程式應如何規範，基於事物本質應與一般外國人之簽證為不同對待，主管機關外交部迄今尚未訂定相關法令將之與一般外國人加以區分，自有不當。」

在臺灣的司法實務上，對於外籍配偶的差異性對待尤深。特別是外籍配偶離婚或喪偶時所面對居留原因消失、居留許可遭廢止等情形，茲舉以下數臺灣司法實務上有關外配家事上諸案例參考：

（一）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4 年度家上字第 97 號裁定

該裁定引述社工員訪視報告，就訴請離婚之越南配偶之經濟能力、語言能力、親屬支持系統等面向提出質疑，作為裁判親權行使歸父方的論據。論者認為（施慧玲、陳竹上，2011），有關離婚後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歸屬之認定，1996 年起臺灣係以「子女最佳利益」為最終判斷之依歸。外籍配偶來自異鄉，面臨離婚訴訟之際，各方面有形、無形的資源往往無法與臺灣人比擬，難免居於劣勢，若未審慎規劃，無疑將扼殺其親權行使之機會。

（二）最高法院 95 年度臺上抗字第 402 號民事裁定

其謂：「比較兩造之經濟狀況、人格特

質、居住狀況及支援系統、照顧經驗，伊均較相對人利於子女，且伊對子女同有親權行使之意願；若子女 2 人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相對人任之，則伊縱已放棄越南籍，日後恐有遭遣返之虞。」這種以未來不確定的因素（日後恐有遭遣返之虞）作為裁定主要的考量，呈現出外籍配偶是否取得子女親權行使將決定其居留權之窘境。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533 號判決

本案係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但書第 5 款所稱「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之解釋適用，判決認為：「參諸臺灣目前社會，父母在外謀生，孫子女由祖父母照顧者比比皆是，殊難認會對孫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之損害；更何況本件係由未成年人之父與祖父母共同照顧，更難認有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縱本案越南母親主張其若遭遣返出境，未成年子女將處於隔代教養情形，由判決理由可知臺灣司法實務認為隔代教養又怎樣？對該款規定採取從嚴解釋之立場。

然而，也有少數實務具有開創性的見解，以外配家庭權為判斷的核心。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2581 號判決（蔡震榮）：「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4 條強制驅逐出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裁量權，核原告業已長期居留我國並娶妻生子，家庭

生活重心係於我國，臺北縣政府驟然以上開事由，限令原告出國，參酌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曾經被拒絕入國、限令出國或驅逐出國者』得為禁止其入國之事由，難無慮主管機關復基於此事由，禁止原告入國，而致對原告造成之損害，顯然與系爭處分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系爭處分所憑事證，原不影響我國對外國人之管理及國家安全），失其均衡，有悖比例原則」。但總體來說，對於外配的管理上，仍多以管制及國安為考量，欠缺較人性及細膩的深入關懷；即便是研究補助上，也缺乏對於離婚外配的關照（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3341 號判決，內政部拒絕核發臺灣外籍配偶發展協會申請有關「未設籍之外籍配偶離婚後滯留臺灣問題研究計畫」的補助），殊為可惜。

參、結論與建議

外籍配偶願意不遠千百里移民至臺灣，表示臺灣有過人或值得生根發展之處。在思維上，臺灣方面不應一直停留在抽象的安全管理與利益上打轉，而應運用衡平、寬容的態度將民主、法治、人權的果實與外配分享，並使新移民者能融入臺灣社會，進而有歸屬感（黃炎東，2009）。

研究發現，外配的社會網絡還是以相同族群和階級者為主，網絡中的成員以工作相關認識人數最多，能提供給外配的支援也最大。渠等社會網絡小、同質性高、非常封閉，其族群關係及階級關係兩因素，是影響渠等網絡發展的重要因素（蘇

駿揚，2007）。臺灣政府除照顧輔導外，應有義務整合資源提供多元服務；在社會層面應建構支持網絡，在家庭層面應扶植建立和諧關係；在個人層面應提升其自我職能，儘快讓其能融入本地社會，避免因不合理的保障差異，衍生道德困境（李震山，2004）。

在社會上，也有外配自主性地成立新移民關懷協會等「我群」（we-group）等團體，來擴大服務新移民家庭，同時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落實照顧、關心新移民及弱勢家庭，輔導學習工作技能與就業，讓新移民家庭能更幸福美滿。透過這些團體與官方（外交部、移民署及各地方政府社會局）的夥伴關係（Partner Relationship），應能彌補官方資源上不足，亦能更落實輔導照顧政策。

此外，據臺灣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與賽珍珠基金會社工統計曾被外配經常問到的法律問題，主要可分為家事層面的婚姻、父母子女、監護、扶養、家事、繼承、家庭暴力等問題；另涉及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戶籍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等公民權及工作權方面等法律問題。這些法律問題，外配受限於語言、教育程度及文化背景等因素，賽珍珠基金會社工除了提供社工的專業協助之外，法律或權益保障者多轉介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如移民署設於 25 個直轄市、縣（市）的服務站或各地員警機關去處理（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雖然法制環境容有欠缺，但在後端得法律實務上的協助，上開作為仍有相當助益。

對於外配的輔導及照顧，臺灣移民署的自行研究（張呈祥，2010）認為未來政策上應做到下列幾點：

一、組織調整與功能再設計

（一）由中央統籌並分區域設置專責機構；

（二）授權地方政府專責辦理移民輔導事務；

（三）強化移民署縣市服務站的移民輔導功能。

二、公私協力開發人力資源並鼓勵機關進用

（一）組成公私協力合作的網絡關係；

（二）鼓勵公私機關開發人力資源與進用。

三、開創多元觀點的新政策思維

（一）推進同化、融合到尊重的政策價值觀；

（二）創新自我發展的多元管理模式。

四、洞悉實際需求，提升新移民的政策參與層次

（一）強化調查外籍配偶實際需求之機制；

（二）增加新移民參與政策制定機會與提升參與層次。

五、就權益之促進及保障上，則應有如下作為（游美貴，2009）

（一）防治家庭暴力加害人再犯

對於對外籍配偶若有不當對待的家暴加害人，必須設計有防止其再犯措施與規定。必要時應有比對其素行紀錄之措施，以避免再有外籍配偶受害。

（二）迅速連結相關福利的權益保障

當外籍配偶成為單親後，無論是離婚或配偶死亡，至戶政事務所登記時，建議戶政單位應該主動提供相關福利及服務機構資訊，特別是特殊境遇家庭生活補助、外配中心或相關福利服務等等，以保障其接受服務處遇的權益。

（三）排除因為身分證迷思所造成不便性

外籍配偶在取得身分證前，其實諸多生活上的不便（如購買機車、申請電話等等）是對身分證的迷思。如辦理手機門號而言，只要以居留證件即可，但因為需要保證金，容易造成誤會以為非身分證不可；加上若本國籍家庭以此部分大作文章，更使得其本國籍配偶或家庭，可行控制之處。建議針對身分證的迷思，官方應建立 Q&A 的參考資料，廣為宣傳，使新移民可以多了解自己的權益多些了解，也讓一般社會大眾可以打破身分證的相關迷思。

（四）保障勞動權益

對於勞動權益的保障，需要主管機關各地勞工局應投入更多努力，積極稽查雇主是否有不實投保之情形；同時，也應該積極對雇主們倡導聘用外籍配偶時，應該

給予合理的勞動權益。

本研究發現，臺灣的族群歧視不僅構成社會壓迫，拒弱勢種族與族裔群體在社會平等生活的權利，更可能破壞社會穩定，製造衝突。因此以法律禁止、預防、管理族群歧視有其必要。而以反歧視為中心之族群平等法，在世界各國已有立法先例，也是臺灣憲法及相關人權公約所要求。只要在立法技術上設計妥當，適度限縮其原本對外配法制上的限制範圍，應能

達成維繫族群平等之目標（廖元豪，2011）。如此朝兼顧當事人利益與人權發展之途，採漸進方式放寬，諒能使外籍配偶個人能早日融合於臺灣社會，其家庭能和諧穩定發展。

（本文作者：程立民為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王信文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女性外籍配偶、婚姻家庭、權益保障、臺灣

📖 參考文獻

- 王信文（2014），性別平等導向之資訊科學教學方法對於商管學院男女學生的期望與價值信念改變之探索，中華民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頁 1-20。
- 李惠宗（2012），憲法要義，元照出版。頁 253。
- 李震山（2009），論外國人之憲法權利，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元照出版，頁 344-351。
- 李震山（2004），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6 期，頁 66。
- 李震山（2003），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頁 64。
- 李震山（2004），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6 期，頁 97。
- 張菁芳（2008），臺灣地區外籍配偶適應生活之社會需求初探。中華行政學報，第 5 期，頁 165-174。
- 許崇賓（2009），外籍配偶工作權之問題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4。
- 陳德信（2002），在臺大陸配偶吶喊：「我的人權在哪裡？」，話題雜誌，第 34 期，頁 86-89。
- 黃炎東（2009），新移民人權、民權與多元文化公民權的探討，通識教育與警察人才培育學術研討會，頁 8。
- 張呈祥（2010），在臺外籍配偶社會認同之研究—以臺中市印尼、越南籍配偶為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自行研究報告，頁 165。
- 法治斌、董保城（2012），憲法新論，元照出版，頁 153-154。
- 廖元豪（2008），移民—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頁 85。
- 廖元豪（2011），馴化並面對族群歧視--為制定「族群平等法」而倡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38-50。

- 廖元豪（2004），海納百川或非我族類的國家圖像，收於「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法治與現代行政法」，頁 305。
- 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臺北：三民，頁 94-95。
- 蕭勝芳（2011），大陸配偶面談政策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6。
- 葉南君（2011），論無證移民的權利保障，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2。
- 葉南君（2011），論無證移民的權利保障，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4。
- 鄭津津（2008），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就業之問題與未來政策應有之發展，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6 期，頁 128。
- 蔡青龍、鄭冠榮（2010），臺灣移入配偶的微型企業經營與參與－北部越南小吃店的個案分析，2010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研討會。
- 蔡震榮（2006），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論驅逐出國處分－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2581 號判決，法令月刊，第 60 卷 8 期，頁 21-37。
- 游美貴（2009），大陸及外籍配偶生活處遇及權益之研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自行研究報告，頁 171。
- 蘇駿揚（2007），跨越族群或物以類聚--越南籍女性配偶在臺灣的社會網絡形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
- 移民政策與制度總體檢案調查報告（五）（2007），監察院公報，第 2588 期，頁 27。
- 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 自由時報（2014），「泰男臺女難團聚 結婚面談三度失敗 立委批刁難」，AA1 版。
- 自由時報（2014），「假結婚演成無國籍 越女求助解套」，AA1 版。
- 余政（2014），<http://anan6.webnow.biz/china/paper/paper.htm>，瀏覽日期：2014-02-26。
- 臺灣內政部戶政司（2014），http://www.ris.gov.tw/zh_TW/346，瀏覽日期：2014-02-25。
- 臺灣入出國及移民署（2014），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47109&ctNode=29699&mp=1>，瀏覽日期：2014-02-26。
- 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2014），<http://migrantlabor.blogspot.tw>，/瀏覽日期：2014-03-07。
- 越南話題論壇（2014），「不信真理喚不回...我和臺辦處的鬥法」，
<http://dai-loan.com/vbb/printthread.php?t=6820&pp=40>，越南話題論壇，瀏覽日期：2014-02-28。
- 楊君仁主編（2011），新移民的勞動權利與法制，巨流出版，頁 65。

監察院（2014），「據施威全先生於中國時報撰文，指外交部對於拒發外籍配偶申請來臺簽證不告知理由，及救濟管道有無等情，均涉有侵害人民家庭團聚等基本人權之虞乙案」調查意見

http://humanrights.cy.gov.tw/AP_HOME%5COp_Upload%5CeDoc%5C%E8%AA%BF%E6%9F%A5%E5%A0%B1%E5%91%8A%5C98%5C098000337%E5%A4%96%E7%B1%8D%E9%85%8D%E5%81%B6%E7%B0%BD%E8%AD%89%E6%A1%88%E8%AA%BF%E6%9F%A5%E6%84%8F%E8%A6%8B980820.doc，瀏覽日期：2014-03-5。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14），

http://www.laf.org.tw/tw/b3_1_2.php?msg1=29&msg2=349&PHPSESSID=tnhfcmekbkf0h139hq1h480cm6，瀏覽日期：2014-03-10。